



文明之间的互惠认知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
并存还是消亡：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

7

上海文化出版社

跨

文化对话

Dialogue

Transcultural



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跨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文化对话

7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对话.7/乐黛云等主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9

ISBN 7-80646-359-3

I. 跨… II. 乐… III. 比较文化-研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867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陆震伟

跨文化对话(七)

乐黛云等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cl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cl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35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6-359-3/1·361

定价:1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063782

《跨文化对话》

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
与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

并列入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

面向未来的文化间文库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新世纪第一个春天,欧洲跨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中心和中华文化书院共同举办了“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二十余位学者分别来自中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他们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对会议主题发表意见。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互惠问题。法国物理学家勒布隆提出技术更新之快使人们逐渐失去对其社会功能进行思考的时间,单纯的技术应用和对利润的疯狂追求成为比科学本身更受关注的事情,这不能不导致社会的深刻危机;会议一致认同自然科学离开了人文精神的指引会导致人类自身的灾难。第二,不同文化之间知识的互惠问题。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首先提出权力造成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分野,弱势文化群体不但成为强势文化进行知识征服的对象,而且会在缺乏自信的心态之下将主动的知识吸纳过程转变为自我强加的过程,因此很难作到真正的互惠。伦敦大学人类学家真列教授进一步回应说,知识“互惠”并不是作为确定的必然结局,而是作为以平等为前提讨论的结果,它不会轻易落在现实中,而要靠人们的不懈努力。我们在这里发表了会议的详细纪要和几位教授的专题发言。

本期发表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和美国哲学家郝大维合写的《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2001年度北京大学蔡元培学术讲座讲稿)也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互惠认知的范例;陈来教授为本期所写的有关《孔子哲学思微》的书评则进一步阐述了互惠认知的一些重要原则;中国人类基因组主任杨焕明博士所写的《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一文更是一篇充满睿智的、有关人文精神与科学知识互惠认知的重要论文。

哈贝马斯访问中国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反映也各有不同。刚从哈贝马斯的学术根据地法兰克福研究所访学归来的曹卫东先生一直随同并担任翻译,作为第一手材料这里刊载了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

由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王宾教授担任中方项目主持人的跨文化研究项目“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经过数年努力已初见成果,本刊过去已登载过《经验》《自然》等研究文章,现发表林岗教授的《美》。另外,杨荣国教授的《真》、叶舒宪教授的《善》,也将陆续刊载。

杜小真教授曾为本刊写过有关勒维纳斯《伦理与无限》的书评,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勒维纳斯是法国最优秀的研究犹太经典《塔木德》的专家。这次,本刊特发表杜小真教授和勒维纳斯最好的朋友马勒卡教授讨论犹太教和勒维纳斯的对话,希望能引起国内学者对十分重要但尚觉陌生的犹太文化的更多关注。

本辑作者介绍

让－马克·莱维－勒布隆

Jean－Marc Levy－Leblonde(法国)

尼斯大学物理系教授

杨焕明 (中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主任, 博士

维克多·马勒克

Victor Malka(法国)

巴黎犹太高等研究院教授

杜小真 (中国)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安乐哲

R. T. Ames(美国)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郝大维

D. L. Hall(美国)

已故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教授

曹卫东 (中国)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柯西莫·真列

Casimo Zene(英国)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阿兰·李比雄

Alain Le Pichon(法国)

欧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长, 塞尔日－蓬图瓦兹大学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 (中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金丝燕 (法国)

阿尔瓦德大学副教授

汤用彤 (中国)

已故北京大学前副校长, 教授

伍晓明 (中国)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东亚系副教授

林 岗 (中国)

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 威 (中国)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比较文学硕士, 悉尼理工大学新闻学博士, 自由撰稿人

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美国)

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陈 来 (中国)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目 录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科学与人文

并存还是消亡？

——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 [法]让-马克·莱维-勒布隆 (1)

人类基因组的秘密与人类的未来

——再论自然与人为 杨焕明 (10)

前沿碰撞

“那里有一些火炭,我只不过在上面吹了口气”

——关于犹太教和勒维纳斯的对话 [法]马勒卡/杜小真 (23)

儒家思想与实用主义

[美]安乐哲 [美]郝大维 (36)

哈贝马斯的文化间性

——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曹卫东 (51)

圆桌会议

“文明之间——互惠知识与在线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赵 嘉整理 (62)

- 自我·他者·虚己 [英]柯西莫·真列(70)
关于“互动认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法]阿兰·李比雄(74)
从“天下”到“国族”
——兼及“互惠理解” 王铭铭(79)
-

海外专递

- 传统:演进还是革命
——论当代中国文学的纯文学倾向 [法]金丝燕(90)
-

学海钩沉

- 叔本华思想中的东方因素 汤用彤(114)
-

古典新读

- “礼治”与“法治”
——兼论罪感与耻感 伍晓明(123)
-

新论快览

- 中西文化关键词研究:美 林 岗(135)
-

说东道西

- 别了,镀金时代
——兼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张 威(162)
-

历史回眸

- 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赴法国的中国人 [美]史景迁(169)
-

要籍时评

- 比较哲学视野中的“思考”
——从《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的译名说起 陈 来(188)
-

并存还是消亡？

——关于技术发展的忧思

[法]让-马克·莱维-勒布隆

理解科学今日之处境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过去数十年间我们所经由的道路做一番回顾。当回想起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研究者时的情形，我深为当年我们都如此乐观而感到惊讶。那时，我们坚信科学能很快解决科研领域中的前沿学科——比如粒子物理学——所面临的所有严肃理论问题；而且我们也丝毫不怀疑科学有能力解决那些困扰着人类的严重的具体问题（当时正是“对癌症宣战”的年代）；我们还确信科学的进程能够无限地发展，从而不断吸引来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期待事实上只是种谬见。科学正遭受着字面和比喻双重意义上的“信用损耗”（loss of credit），在其政治与经济支撑日渐削弱的同时，它的文化声望也遭人抨击。在此期间，学院式的科学话语得意洋洋的自满已经让位于对灾难忧心忡忡的预言，各种不确定性正威胁着科学的未来，而我们的做法却是一方面指责政治家（“因为他们不理解——或不再理解？——基础研究在经济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又在批评公众（“因为他们向那些质疑科学知识在我们文化中重要地位的反科学和反理性思潮的新波动投降”）。

于是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热切恳求科学文化——用盎格鲁-撒克逊的说法就是“公众对科学的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有更广阔、持续的发展，并呼吁媒体、教育系统和研究者为了这一目标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较之过去，这种努力表现了

一种进步，因为以前科学家普遍认为离开实验室去对外行的公众发言乃是玩忽职守和放弃责任的举动。他们把分享我们知识的责任留给了那些退休的学术权威和媒体专业人士，同时却在抱怨科学未能很好普及化的恶果。然而上述这种新的立场仍然没有摆脱模棱两可的特征，我下面的评论将要强调其中的两点。

首先，正如“公众理解”这种表达所清楚地展现的那样，好像问题仅仅与知识的理解有关。换言之，我们愿意相信如果公众不赞同或不支持科学的发展，那应归咎于他们不够理解科学发展这一事实。然而我们应该更明智地承认，这与其说是知识的问题，倒还不如说是权力的问题^①。毫无疑问，我们的同胞愿意去搞懂基因或是核能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们可能更愿意通过选择研究方向，在技术科学发展上运用决策权来做一些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已大大超出本文的框架，它关注的不是别的，而是将民主扩展到科学和技术选择权上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科学和技术上的选择权回避了当前的民主程序，我们提出这个纯粹政治性的问题，实际上就超出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这一框架，因为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知识的分享，而首要的是权力的分享。

我的第二点评论如下：在使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这一表达时，我们是在不自觉地人类划分为无知的外行大众和与之对立的学养丰富的科学家们。然而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这种两分法已不复存在，我们科学家除了在极狭窄领域拥有些专业知识之外，我们与大众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面对着像基因控制和无性繁殖之类的问题，比如我就完全——几乎完全——与外行公众处于同样的位置。即使在核能领域，一方面我作为物理学家的能力当然能让我意识到放射性的危险，但它并不能帮助我认识到核能工厂所承担的风险，这更多的是与管道工程和混凝土有关而不是与原子核有关。这些对现实的错误传言都是十九世纪人类被划分科学家与大众的后果，在此类划分中，前者被视为普遍与总体知识的拥有者，后者

① 让-马克·莱维-勒布隆：《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巴黎，1992年）第一章“关于误解的误解”，第17-22页。

则被认为无知、缺乏分辨能力、需要将知识加以灌输的对象^①。这些错误的观念早就应该摒弃,如今也该是我们科学家表现出多一点的谦逊来承认我们的所知其实相当有限的时候了。

事实上,就更深意义而言,我们甚至都不理解我们自己的科学,我们不光是只掌握了其中内容极有限的部分,而且我们根本不了解它产生于其中的背景。如今的科学家——研究中的行动者——不仅对他们所生产的知识的认识太过贫乏,而且对其社会框架的认识也同样不敢恭维。“两种文化”的问题在这里隐隐出现,乔治·波特告诉我们尽管斯诺有不同的解释,但他并不是心满意足地看着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分离;恰恰相反,他感到这种事态高度可悲。不过,我觉得斯诺的论题既不太具有说服力,而且也仍过于乐观。不很有说服力是因为所谓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文化”一词只能以单数形式思考,它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样都是“整一且不可分割的”。

如果它不是非文化的话,那么实际上我应该将这种支离破碎的文化称为何物?文化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有能力去表达人类所有活动向度之间有机的联系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像保罗·加吕兹所提醒我们的那样,现代科学在大约四个世纪前从欧洲文明内部产生起就一直从属于文化的缘由。然而科学在与文化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有机联系之后,它已经向充分自律进化,如今已和文化完全疏离。换句话说,我试图说明的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科学文化”,因而比起那种简单地认为科学文化已掌握在科学家手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去寻找传播科学文化更有效的手段的看法,形势就要严峻得多,因此问题乃是如何将科学(再次)嵌入文化之中,而这这就要求从事科学的方法发生深刻的变化。

科学中不复存有文化的断言^②引发了争议重重的冲击,为了接受这一立场,人们必须承认在构成现代科学历史的四个世纪中,

① D. 雷士瓦格和J. 雅克编:《博学与无知》(巴黎,1991年)。

② 更详尽的分析可以参见让-马克·莱维-勒布隆《风趣的思想:科学、文化与政治》(巴黎1984,1987)。

本世纪迎来了它空前的发展。为了使讨论不至于显得太过抽象,再加上因为我不能发展出一套更详细的分析,所以我的讨论将仅限于举例,列举一些我认为能说明情况的事例。

让我们首先从对科学实践的内部考察开始。

1、线性模式的终结。古典的观念认为科学伴随着知识的累积和自然的进步在以一种线性的方式发展,如今这种信条已遭到根本的质疑。在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已目睹了令人惊讶的历史上的滞后事件,比如人们对一些原先被认为完全封闭的研究领域兴趣的复兴。我们这一代的物理学家从小就被教育说只有亚核物理学或天体物理学才是有趣或有声望的学科,然后我们怀着极大的惊讶之情,目睹了在很短时间以前还被认为是“十九世纪的科学”而被搁置一边、从而完全废弃的学科的再次兴起。我指的是流体力学,更概括地说来是非线性力学,它们无疑是今天物理学研究中最活跃、最令人感兴趣的领域。我们必须追溯到近一个世纪前才能发现一些已被我们全部忘记的科学进展,我们还应再重读一些像普安伽赫这些并不属于我们专业背景作家的著作。同样的现象在其他研究部门也有发生,不过看来我仍应该停留在物理学领域来讨论。近来关于量子物理学的哲学与认识论的争论——它们在二十年代一度十分热烈——的复兴,也提供了类似的案例。跳回半个多世纪前,当时这种争论被认为已经绝迹,看来我们还必须重新找出那些太快被认为过时而束之高阁的消息来源。很明显,研究进程线性模式的终结向科学群体提出了更严肃的问题,因为它使得所有基于只研究当代科学的研究训练模式变得毫无用武之地。

2、专业人员研究水准下降。我相信现在的科研质量低于过去平均水平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这种情况的确属实的话,那它表明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方法论失常。只要看看近几年论文中出现的事件——比如“低温焊接”或“水记忆”——都说明了这些失常并不是个别现象或是局部失误的结果。恰恰相反,这些都是普遍倾向的症状,我们当中那些担任科学杂志评委的人,也觉察到那些提交发

表的论文的方法论、实验和观点的质量都比较糟糕。

3、适用性的丧失。比科学生产增长的平庸甚至更为严重,后果的问题就是对不远的将来适用性的丧失。研究者可以去浏览一下他们领域三十年前出版的(最好的)杂志的内容,然后再问问自己每篇文章后来都有哪些回应,这样做可能会有高度的启发性。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论文并没有留下任何让人感兴趣的遗产,这个问题更多的不是与研究者个人的投稿有关,而是与研究者自身的学科有关系。我意识到,这当中的许多论题尽管今天已经被人忽略,但可能在未来的年头里再次迎来人们兴趣的涌动。不过现在绝大部分的科学生产正处于丧失其意义的途中。如果不是出于别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它们缺乏可见性,这一结论可以由经验的结论所支撑。在分析引用率时,科学参考文献专家发现,(比如像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ISI 的出版物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论文从未被人引用过(除了作者本人在其研究报告或其他论文中提及以外)。至于那些真的被引用的论文,其可见性也相当短命,原始的(研究)和间接的(综合)科学文献的参考文献平均只追溯到四五年前,很少有更提前的,超出这个界限就没人再会记得了。另一方面我们还不清楚,出版形式和信息贮藏量正在发生的变化如何才能够弥补这种显然无法避免的过时。

不过,科学的去文化倾向最严重的方面还是发生在科学研究的外部,即科学世界本身与一般社会之间的交界面上。这里我还是准备举几个能被轻易归纳的例子。

1、污血丑闻。两三年前法国遭遇了一场由所谓的“污血丑闻”(the contaminated blood scandal)所引发的关于社会、政治和法律的热烈辩论,迄今仍是余波未息。人们发现法国卫生机构理应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能充分行使控制血液质量的权力,以致引起艾滋病通过向几位病人、尤其是血友病患者输血而被传播。但由这场丑闻所引发的法律、卫生和科学的讨论却相当肤浅,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缺乏更深层次的历史认识,就像玛丽-昂热勒·埃尔米特在其著名的分析输血与法律经验间长期存在的联系的书中所展

现的那样^①，这实际上是个相当古老的问题。该书指出，第一例因输血的不良后果而指控医生的诉讼要追溯到1668年，这大约在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之后不久。1670年巴黎议会正式禁止医生和军医实施输血措施，这种谨慎事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些与输血相关的有趣案例，提醒我们想起了今天的艾滋病问题。比如上世纪末，输血在更加消毒的条件下实施，但它们还是经常引起梅毒的传染，这又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性传播疾病其实是由输血而扩展的又一桩案例，并引发了几宗诉讼和一套令人着迷的法律的确立。在详细考察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案例非常丰富地包含了与研究相关的正义的角色以及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等复杂的信息。毫无疑问，如果卷入讨论的科学家、政府雇员、医生、政客和律师对血液与法律历史有更好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即使不能完全阻止这类事情再次发生，至少也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的。

2、科学论战。近来在法语和英语世界关于科学论战有非常多的讨论，这些公开化的冲突是由“索卡尔事件”暴露并不断扩大，目前它已经促使几位“硬”科学家去反对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②。一大批物理学家——其中也包括著名的诺贝尔奖得主斯蒂芬·温伯格——已经参与到这场激烈得使人惊讶的争论中来。显然是索卡尔的恶作剧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人们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说，这是他们一直在寻求的机会——来表达他们对任何将科学置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框架中作为社会活动来研究的行为的强烈反对。对这批科学家而言，这种研究除了造成破坏科学知识合法性因而不可接受的“相对主义”之外，没有揭示任何问题。然而在分析其论据时，人们马上会因这些专家——当然在各自的领域内部都是鼎鼎大名的——面对社会和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和历史时基本上很天真的言行而为之动容。在批评社会科学家把某些“硬”学科的发现过多地进行了比喻性的使用时，“硬”科学家们——尽管有时他们专

① 玛丽-昂热勒·埃尔米特：《血液与正义》（巴黎，1990）中“论输血”一章。

②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知识的欺骗》（巴黎，1997），因特网上也有大量可用的信息以供参考。

门的批评被证明是对的——经常表现出对社会历史和哲学研究特殊本质和方法的误解,这些误解远比他们所批评的社会学家对物理学的误解更严重。这仍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古老故事^①……这个例子非常引人注目地表明科学世界中文化的根本缺乏。如今形势变得相当严峻,因为“硬”科学首先面临着意识形态的压力和比以前更重的经济压力,这些压力需要有建立在社会和人文学科发展之上的关键力量来加以平衡,倘若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的发展不够合格将会非常危险。

3、没有兑现的诺言。我们谈论文化,因而也是在讨论记忆。面对着一个世纪的终点,回头去看看过去的几十年,重新想想那些以科学家的名义许下的诺言,肯定是人之常情。较之其他研究者,尤其是相对于目前正处于研究前沿的生物学家来说,我们物理学家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我们已经远远经过了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中看出许多问题(就像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莱奥帕尔德》中的萨利那亲王所非常了解的那种老式贵族,远比年轻的中产阶级更加清醒)。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物理学的诺言,再勾勒一下当时物理学家的宣告和今天生物学家的宣言之间的相似性,这将会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允诺核能将会为所有人提供免费的能源,那时的流行杂志根据专家的观点很认真地预言说,到世纪末每个人在家里和车上都会有一个小的核反应堆,大型的热核聚变技术也将被掌握。很显然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根本没有接近这个目标的实现。至于生物学,如果再回想一下六十年代对癌症宣战的预言,我们就会不得不醒悟到:三十年后的现实的进展又一次按照迥异于预言的方式在进行。因此在讨论传言中的基因疗法的前景和其他生物工程奇迹时,多一些谨慎是很明智的。反思过去能帮助我们多一点谦逊,阻止我们许下草率的诺言,这些很可能会回过头来改变公众的态度。科学家们的抱怨实际上相当肤浅,他们觉得公众不理解科学、对革新反应恶

^① 让-马克·莱维-勒布隆:《误解与轻视》,《合金》35-36期(1998年夏-秋合刊)。

劣、甚至表现出“非理性”的恐慌,却忘了社会公众仍记得他们过去许下的诺言,尤其是当这些许诺未被兑现的时候。

经过数十年令人惊讶的生产力增长之后(在此我有意使用了经济学家的语言),我们现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如今劳动分工的反生产性日益明显,它迫切需要将那些构成科学家活动的不同任务重新聚合,以便使人们在分享知识的同时也必须去生产知识,这就意味着要锻炼科学家从而使他们可以既是研究者也能执行其他任务。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详细训练研究者的方法。颇为吊诡的是,这种新方法能够在其他部门原有的实践基础上被显明。因为如果不向这些研究者提供对科学史的理解——最主要的是他们学科的历史——和关于科学的哲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认识,我们又如何才能培养出新的专门科学家呢?目前他们在专业中所面临的任务以及无法回避的社会责任都要求他们对科学活动有更广泛的概念,我们不能再我行我素,仿佛科学不同于艺术、哲学或者文学,它们似乎可以抛开其学科历史而被传授教育。

科学必须要重返文化中心,为了这一目标,它自身必须要与其历史达成共识。要捍卫这一观念,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别人所谓热衷过去的指责当中。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有新的开始,我们就必须怀着这个新的目标,对我们的历史获得更好的理解。保罗·加吕兹所举的关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大百科全书派的例子相当具有象征意味:科学的主要支持者恰恰需要新的科学革命之中——包括化学——重新反思其学科历史。这种对于历史的兴趣毫无复古的意图,正相反,它表达了一种为取得更加流畅的进步而认清形势、了解自己身在何处的渴望。

也许已经太迟了,并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有可以完成这些必要转变的必然条件,讲这句话时,我毫不轻松。的确,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科学文明走向尽头的例子:希腊的科学只延续了几个世纪,我们受益甚多的伟大的阿拉伯科学^①持续了几百年就中断了,让其他文明占据了主导;我们甚至还有过一些伟大的文明,就我们所

① R·拉塞德编:《阿拉伯科学史》(3卷本,巴黎1997)。

知，科学在它们当中并没有被作为根本性的重要活动来认识和尊重。在这方面，我们将希腊和罗马文明作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与知识有着完全不同的联系，印度和中国的比较也是如此。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在将来的岁月里，我们的文化——现在是全球化的——会和过去几百年一样，继续把科学置于基础的地位。下面情况很可能发生：即科学变得如此有效（所谓的“技术科学”），以致于它的实践功率赢得了高于其知识向度的地位。在当前形势下这种发展非常有可能，甚至看起来也似乎比较合理。如果我们要拒绝这种前景，而坚持保留科学工作的理论维度，维护其作为人类心智伟大的历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方向以保证和过去几百年间所描绘的方向保持一致，我相信欧洲能够被委以重任并完美地完成这项任务^①。欧洲文化的独有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与大西洋和太平洋对岸的那些地区的文明不一样，它更乐于接近依然丰富的过去。这样的丰富与复杂可以明显地被看到，不论何时人们去罗马这样的城市游览，他总会在那里看到乔尔达诺·布鲁诺的雕像高耸于罗马鲜花广场之上，与圣玛利亚·德利·安杰利这样的教堂并肩而立。布鲁诺是在1600年被判以火刑活活烧死的，然而仅在一个世纪后，即1700年，罗马教廷就下令在圣玛利亚·德利·安杰利教堂的地板上绘上巨大的日晷（sun-dial）图案^②，因为它已成为天文学基本的工具，这说明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历史复杂性。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在漫步布拉格时看到，在那里你会挨个从开普勒、布尔兹曼和爱因斯坦的雕像旁穿过；或在巴黎，你可以从柏雷斯的圣日尔曼教堂的笛卡尔墓出发，途经巴黎综合工学校、藏有福柯钟表的先贤祠到达居里夫妇在圣热纳·维埃夫的实验室。对欧洲而言，科学文化并不是抽象和遥不可及的概念，它确实实地在那儿存在，我们敢唤醒这位只是在沉睡的美人吗？

（秦 晶 译）

① 见《欧洲的科学与文化》，《合金》（1993年夏-秋合刊）。

② 埃布龙：《教堂：科学的工具》，《合金》（1997秋），31-41页。